

第八章 犹有竟时

黄金时代

转眼到了1960年春天。这个时候管理所的改造与生产是我们进以来最好时期，可以说是管理所战犯的“黄金时代”。单说生产，7所生产的鸡蛋，不但能满足战犯自己吃，还能供应市场；日本战犯不但养鸡有成绩，同时还开荒种稻。日本战犯的人数虽然没有我们多，但是在崔科员领导下，干劲十足，种了不少水稻，我们很钦佩；3、4所在山上开荒，逐渐扩大了耕种面积，在电机厂劳动之外，养猪、设无线电组；1所分担大厨房，喂马、培植蘑菇。

3月20日，举行了生产方面的评比发奖大会。这天很热闹，战犯敲着锣鼓向政府报捷，各单位积极挑应战。奖品有1、2、3等奖，我是被表扬的，奖品有秋衣、毛巾。一般战犯由政府发给一个精制的日记本，一条麻纱手帕，一个印有“劳动光荣”的背心。得奖与不得奖皆有所得，大家欢喜。

我与姜明文、张大光、尚传道，代替1所开会的战犯下厨房做饭。姜明文做大米饭，我与张大光炒木须肉。姜明文把大米饭做糊

了，糊味儿大俱乐部都闻到了。我与尚传道两人打鸡蛋，打了一个多钟头，有一千多个。另外每人还发了两个煮鸡蛋和一袋白糖，当时的物质很丰富。

下午，我参加了评比会。一个日本战犯的发言感人肺腑，他说：“……我们过去屠杀了中国人民，屠杀了许多儿童，现在由我们喂养的小鸡下了蛋，可以给中国人民吃，给中国儿童吃，我们内心得到了一点安慰……”

无线电组把装好的一部收音机放到俱乐部的台上，当场播音，声音很好……这一切都说明我们这些战犯能够生产，能够自食其力。我心想，不经过改造，我们这些人只会发号施令，指手划脚，经过改造都变了，不变也不行。

这样的会 1957 年开过，只有奖没有惩，这一点不同监狱和劳改队。那里每年都开奖惩大会，有奖也有惩。有的加刑、有的戴镣，严重的还有当场枪毙的。战犯管理所只有奖，所以叫“评比发奖大会”。只奖不惩，用好的来鼓励不好的向前争取。这个评奖大会也是一种教育形式，我们多数有所领会，增加了劲头。

3 月底，电机厂扩大，把 2 所的房子打通，把车工、钳工的房间打通，做翻砂用。这个工程很大。2 所的房子都是小间，所有的间壁都要打通，还要铺水泥地。白天照旧在电机厂劳动，夜里分前半夜，后半夜去 2 所，我多数在后半夜干活。这样一直搞了半个月。筛石子、拉砂子、运砖，人人不闲着，大跃进的劲头在我们这里也起来了。这么一来，电机厂扩大了，将来这个工厂变成国营企业，我们一变身份就成了工人，这有多好。

每天下午大澡堂子烧水，叫我们洗澡。金所长说：“多费一点煤不要紧，烧点水洗洗澡，解乏。国营企业的工人也有每天洗澡的。”

我们感到政府想得真周到，同时觉得金所长对我们了解得很深。有人判断他是朝鲜族人，日本战犯最多的时候，他是管教科长。他的理论水平不低，仪表风度也大方，善于说服人，鼓励人，他的名字叫金源。当会计的那位郑科员是他的爱人——我们东一凑，西一

凑，什么都知道了。有的是从电机厂传票上看到的名字，有的是从干部谈话中听到的东西。战犯谈论干部是常事。

过了“五·一”，政府组织我们参观。由于日本战犯在1956年参观过大青人民公社（当时还是农业社），现在他们要求再参观一下，看看这几年的变化。政府批准了他们这个要求，还一并参观抚顺市郊上游人民公社。

我们辽宁队的一部分人在1956年来过这里，这次听刘主任报告，感到进步太大了。我们听报告的这个大俱乐部就是新建的。

中饭以后，组织家庭访问，我知道不论哪次参观都必然选我作代表，他们的理由是，第一，关梦龄是东北人，说话对方能听懂；第二，关梦龄记性好，回来能传达完整；第三，不说了，第三是什么？谢罪的时候关梦龄会哭。因为怕哭，所以姜明文、黄炳寰、李衍涛都不来，一致选我，我也不好意思说破，这次当然又选了我。出发之前，由衣科员领着，告诉我们不要激动，就是说不要进门就哭，什么话没说，一进门就跪下，一大群呜呜地哭起来，叫人家莫名其妙，使人感到不吉利。这次交待一下非常好。

我们这路有李寓春、袁剑飞几个人。社里来了一个女干部，把我们引到一家姓崔的老大娘家，说是老大娘，也不过40岁。家中男人都出去劳动了，儿媳妇也去劳动了。我们进屋坐下之后，我先开言，问老大娘家中人口、生活，唠起了家常话。

这家6口人，两个半劳动力。家里养鸡、养猪，房后还有自留地，屋里摆得也挺整齐，也是一个小康之家。我想，过去我们吃喝嫖赌，每日瞎忙，并没有得到快乐。真正的快乐是一家人吃饱了饭，大人孩子团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无忧无虑，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躺在炕上问心无愧，那才是快乐呢！我们过去那些所谓的快乐，都是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戴笠在北京，一天已经过夜3点，他要跳舞，叫我去找乐队，找几个“太太”，我只好派车派人去找。那夜是招待宋子文，跳完了舞天已经亮了。这就是不管别人，只要自己高兴的典型。这不是快乐，这是罪孽。

崔大娘与我们谈话兴高采烈,但是谈到解放前的情景,马上难过起来……我发觉袁剑飞想说话,想了半天,想起来一句话:“老大娘,你们这儿民兵站岗不?”

“站什么岗?”老大娘没明白什么意思。

“他问,你们这儿的民兵站不站岗,防备坏人?”我从旁给当翻译。

“哎哟,没有站岗的。反动派都没有了,这村子里坏人也没有了,不用防备。”

我们这些人从不与社会上的人接触,说出话来叫人莫名其妙,笑话百出。

参观中还出了一件使人不愉快的事。下午刘主任在大俱乐部介绍情况,金所长与刘主任都坐在前面,刘主任给我们讲话。金所长用暖水瓶给刘主任倒水泡茶。刘主任没有顾得上喝。讲完话刘主任与金所长离开座位,刘主任还没走出门,3所战犯梁津便站起来,走到桌子前面,把刘主任那碗茶端起来,喝了。别人一看太不像话,上前制止,他不听,结果硬是把那一碗茶喝光了。真丢人啊,他给这次参观点缀了一件事,真令人扫兴。

另外一组有刘佩玺、陈旭东,他们也访问了一个老大娘,这个老大娘一见刘佩玺就说:“好个姓毛的,解放前你把我儿子拉去了,你还打我!”这个老大娘拉着刘佩玺不放,后来白科长对老大娘说:“他不姓毛,他没来过东北,您认错人了。”这样解释才作罢。

参观大青公社回来之后,大家都说:“反动派的罪恶到处都是,真若是遇到了苦主,拉住不放,政府也没有办法。”

“如果这件罪没有交,可就不好交待了。”

“看来交罪必须交清,不能马虎呀。”

第二天,参观上游人民公社。先参观引水上山工程,接着参观小学校、中心医院、百货商店……百货商店不知道我们的身份,一个负责人给我们介绍商店的情况,最后他说:“我们经验不够,请同志们多提意见。”

我心想,这意见不敢提,我们是什么人你不知道,我们走了,你就会知道了。

下午到稻田参观,看到有三台电动机抽水浇田。这些水是城内的污水,人们动脑筋,什么东西都有了用处,废水、废料都利用起来了。人民当家,给自己生产,把聪明智慧发挥出来了,都使用出来了。

参观回来,大家心里很亮堂。我们学习了人民公社的文件,看报知道了不少人民公社的事情,但是就是没有亲眼看到。政府组织我们实地一参观,心里明白了,知道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6月准备“七·一”的节目,我把参观两个公社的所见编了一个相声,另由京剧组预备京剧节目,还有一些反映参观的节目。比如苦主错认刘佩玺那件事,战犯把它编成了话剧。

6月30日晚上,已经点完了名,门已经上锁了,班长交给我一个小条子。条子是病号室战犯魏季良与叶佛佑写的,奉大夫批准,明日演出《武家坡》,请京剧组给我们排定出演时间,并明早叫文武场排练一次。

第二天早上,我找蔡省三^①研究,我说:“大夫怎么批准他们演出《武家坡》?为什么这样匆促?”

“既然大夫批准了,上午就给他们排练一次,下午演出。”蔡省三说。

“他们二人还有肝病呢!与我们接触有许多不便,不过没有办法,大夫批准了,都是一个政府,不能不服从,演吧。”

一些戏是不适宜在监狱演的(战犯管理所也是一样),如《女起解》不能演,《武家坡》夫妻分别18年,演出不起好作用。因而这类戏本着政府的精神都不演,白科长很注意这些事。我记得1958年,京剧组要演《打渔杀家》,这个戏里的教师爷要拿一条锁链,一般舞台用很轻的铁链,我们这没有,我到电机厂去找铁链,找到一条拿起来正要走,白科长出来了:“关梦龄,拿的什么?”

“一条铁链。”

“干什么用？”

“演《打渔杀家》的道具。”

“我看算了吧，别拿铁链子了，稀啦哗啦拿到台上多不好，找别的东西代替吧。”

于是我们用黑线绳作了一条锁链，演出了《打渔杀家》。这些影响犯人情绪的戏尽可能不呈请，一贯如此。所以这次演出《武家坡》是想不到的。既然是温大夫同意的，我们不能有什么抵触。我先叫打鼓、拉胡琴的七八个人到大俱乐部。然后报告班长到病号室把魏季良与叶佛佑找来，排练《武家坡》。表面上我很高兴的叫他们唱做，心里总有一个疙瘩。排练了一遍，解散回来，我告诉魏季良说：“把你们这个节目排在下午第二个。”

早饭之后，开始文娱演出。演了几个节目，该我的相声上场了，衣科员指示：“关梦龄的相声放在后面。”

我又把大褂脱了下来，这个相声编得比较生动，所以衣科员让放在后面。正在这时，李科员来了，告诉蔡省三说：“下午有电影，京剧只能演一个，你们考虑一下演什么？”

蔡省三在后台找到了我，一研究，我的相声不演，高青山与郭吉千的《金玉奴》不演，只演《武家坡》。这是照顾病号，并且是温大夫批的。就这样决定了，马上通知魏季良与叶佛佑上场，就这样演出了《武家坡》。

事后，衣科员问蔡省三是谁叫演的？蔡省三说：“温大夫批的。”衣科员没有吱声。我说：“看来这件事叫魏季良与叶佛佑钻了空子。可能他们请示大夫要演戏，或者问他们能不能演戏？大夫说可以演戏，但不一定说演什么戏，而他们就说大夫批准他们演《武家坡》。温大夫决不会决定戏目，这个人不会那么糊涂。”

蔡省三认为我说得对，因为这件事无法对证，过去也就算了。

小关师傅

夏天开展了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电机厂挂起了大幅标语，动员我们进行发明创造。大家都动起来了，刘协理员、王科长到3所，召集学委及生产组长会，进一步动员。战犯们一看政府人员这样重视，便行动起来了，首先蔡省三和我计划把废的矽钢片炼成钢，这样可以把许多矽钢片的碎块炼成原料。我们开始了这项实验。利用铸铝组的焦炉、坩埚炼了几次，因为温度不够没有炼成。吕科长鼓励我说：“你们都是有文化的，动一动脑筋，总可以创造出一些新东西来！”

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暗自责怪自己，真饭桶。又一想，脑子里没有这门知识，“高大精尖新”谈何容易？许多战犯都考虑发明创造，写了一些建议，画了不少图，也费了不少思考，但是成效不大。

我们钳工组甲班计划搞机械绞丝。我画了图，经过蔡省三、杨植等人研究，认为可行，又经关师傅同意，我们利用夜间改制三号钻床的皮带轮。这一来又要车工组张亚东、舒靖南等人加夜班。谢科员对我们实行机械绞丝大力支持，两夜没有睡觉，在电机厂与我们一起改装。改装以后尚可应用，但是因为没有机械绞丝的丝锥便搁下了。

在“双革”运动中，说我们这些战犯一点贡献也没有，那是言过其实，应当说有一些贡献，然而贡献不大。比如钳工组改装了压力机，安装组找了一些生产窍门……虽然这些东西在关师傅他们眼里是值不得提的事情，但是在我们身上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因为战犯这方面知识太贫乏。

政府大力支持我们这是体会得到的，但我从旁感到政治与技术有矛盾，管教人员与师傅们不一致。关师傅、李师傅等人，对我们

提出的建议认为幼稚又可笑。事实上也实在可笑,比如有人提议:“用铡刀切断螺丝杆,可以不用剃子,还能保证质量。”铡刀怎么能切断 M6 的螺丝杆呢!根本没有细想就提出来了。王科长在会上还引用这个例子说,“双革”是一件技术上的大事,不是偶然一想就能解决问题的。

类似这样的“合理化建议”的确可笑,其他一些建议师傅们也认为根本不行。有一些建议谢科员拿到电机厂征求师傅们意见,师傅们否定之后,谢科员回来对我们说:“可以,你们再研究一下。”

管教人员认为战犯可以有发明创造,师傅们认为我们不会有什么创造发明,这个矛盾我从旁看得很清楚。这个“双革”运动,就这样的过去了。

师傅们与管教人员看问题不一样,比如一次我们议论在哈尔滨参观工厂,看了那么些机器和部件,这时李师傅说了:“看了,你们也不懂。”战犯樊迅从旁边说:“我们不是从技术上看问题,我们是从政治上看新中国的进步!”

从这些谈话可以发现,师傅们的政治水平还离不开技术的小圈子,当然,没有技术是谈不到生产的,如果仅仅看技术,也是有局限性的。对于战犯的改造着眼于什么?师傅们还不够明确。我认为学技术比思想改造要容易一些,如果 1956 年我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就宣布:关梦龄学好钳工就开释,别的不干,那么我白天晚上学钳工,几年功夫我就可以掌握一定的技术。但是我在思想上还幻想蒋美卷土重来,还想把人民政权推翻,还想军统那一些老朋友,行吗?

一个雨天的午后,张国泰在 2 号钻床干活,他要钻一个大部件,必须把钻床用扁担抬起来,再拧螺丝。这是李师傅对战犯李文开的指示。李文开把李师傅的指示对张国泰重复了一遍,但是张国泰没在乎,他没有用扁担抬钻床的头部,而是直接用扳手松螺丝,只听“轰”地一声,钻床的头部掉了下来……车间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这时李师傅从小屋走出来,问怎么回事,李文开一

报告,李师傅问道:“你没告诉他,用扁担抬吗?”

李文开说:“我告诉他了,他不听!”

李师傅火了,大声地对张国泰说:“站好,你是反革命!你这是干什么?为什么不听指示?你知道一部钻床多少钱?你总觉得自己有一套,什么思想?”大声批评了许多时候。不一会儿关师傅来了,问李师傅怎么回事?李师傅把事情经过又说了一遍,关师傅没有吱声,站了一会儿,看看钻床没有坏,关师傅走了。

事后,大家说:“头一次看到李师傅发这么大脾气。”

蔡省三说:“这是工人阶级极端爱护国家财富的自然流露。”

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是,张国泰是不对的,但是李师傅在车间那样喊有点过分,什么“站好,你是反革命!”这样的话对战犯说来是完全应当的,况且战犯比一般反革命罪还大,但是不讲场合说出来,也不见得会收到好的效果。我想,这件事如果被金班长碰上,他不会说什么,但是只要在张国泰身边一站,他自己就会很好的检讨,别人也会说张国泰的不对。

电机厂的师傅在改造战犯方面,还是关师傅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也批评人,但是能掌握分寸,注意态度,合情合理。比如赵玉林弄断丝锥,一天断好几个,赵玉林打怵不敢干活了。我报告给了关师傅,关师傅先从技术上分析为什么会断?再从思想上说劳动时不要害怕,学技术要用心。这么一分析,一批评,赵玉林心服口服,背后他对我说:“我们能学到关师傅那样的技术,那种对人的态度就行了。咱们相差太远了。”

关师傅在政治方面如果能加一把劲,那是很完美的。1959年有一天我给他收拾抽屉,发现了他的国文课文,那时他念的是第五册。这件事使我很有感触,我回号对大家说到此事,大家说:“看来谁都要学习,咱们更得好好学习了。”

“五·一”以后,学习《列宁主义万岁》,学习两个月,漫谈多次,还暴露一些错误思想,不知道这个时候为什么学习这个文件?对文件的精神虽然有所领会,但领会得不深。

我在电机厂劳动，心想学一些技术，可是我们一天只有4个小时的劳动。礼拜休息，节日休息，有时听大报告，有时到农园突击任务，有时写外边要的材料。并且产品也限制了技术发展，只生产电动机，钳工组只做胎具、绞丝、下锭子等，没有别的活。这些活很简单，我早已经学会了。一颗有很高热情的心逐渐冷了下来。

这一年，我们甲班钳工组的张禹斌、蔡省三做胎具，我下锭子、绞丝，与外组打交道。陈亲民、赵玉林、樊迅、尚传道的技术不如我，我领着他们干，陈亲民与我开玩笑说：“跟我们小关师傅干活，精神痛快。”

所以，以后他们都叫我“小关师傅”。

我当时干了多少活，关师傅也不大清楚。他知道蔡省三劳动态度好，因为蔡省三总坐在那里做胎具。我呢，一会儿安装组找我，一会儿去领东西，忙得不亦乐乎。钳工组长张禹斌说：“我的腿跑不动了，你比我年轻，你多干点吃不了亏。”这样就形成，关梦龄总不在钳工组，他到哪儿去了？关师傅虽然没有问，但是肯定有这个想法。

有一天，我从一号大钻床回来，车工组吕雅堂、张守谦和张亚东他们三个人在那接皮带，吕雅堂叫了我一声，我就过去了。

“什么事儿？”我问他们。

“小关师傅，给我们接接皮带吧，三根皮带一齐断了，我们还等着干活呢。”

“行啊，你们拿到钳工组去吧，这里没有工具。”

正说到这，李师傅从那边来了，他立刻问我：“你不干活，到这儿干什么？”

“他们叫我接皮带。”我回答。

“当一个车工连皮带都不会接？自己接！”李师傅把他们三人都批评了，我回到了钳工组。我心想，李师傅把自己的徒弟估计太高了，他们会接吗？不一会儿，吕雅堂、张守谦和张亚东一人拿一条皮带到了钳工组，终于还是我给接上了。

事情过去张普林问我：“是他们找你接皮带？还是你自己要去

接皮带？”

“是他们找我去的。”

“是谁找的？”

“是吕雅堂找的。”

“他说没有找你。”

“他们都没有找我，我有神经病？我们钳工组没有活干，我可以坐着，也犯不上到车工组去揽活去。这些人不老实，他们如果不承认找我，我自己去的，那就说明关梦龄不在本组好好劳动，到各工序乱窜。”

问题的中心在哪里呢？就在一些人没有劳动观念，不认真学技术，一切依赖别人，还是过去指手划脚的作风。我认为这件事不大，没有向关师傅、谢科员报告，岂知张普林叫我碰了一下很不高兴。张普林、蔡省三及学委会的人以此为题大做文章，并且得到了李师傅的支持，说我劳动态度不好。在评比时，我连表扬都没有。那么甲班钳工组的活都谁干了呢？在小组中，陈亲民、李介立、张禹斌都同意表扬我，蔡省三、尚传道、樊迅、赵玉林不同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蔡省三与张普林一致，表示学委会看问题的一致性，向政府汇报没有矛盾。樊迅、赵玉林不同意我是因为我在钳工组常给他们提意见，我对他们不客气。他们说：“关梦龄带我们干活，对我们有帮助，这是优点，但是作风还是过去那一套，好耍态度，所以我们不同意他。”评比过去，我心里不舒服，好在这次评比没有发奖，过去也就算了。

“混蛋”这两个字重了

9月12日，调整工种，成立坩埚厂，王科长强调坩埚是一项新的技术，要保守秘密。接着宣布调整后的名单，念到电机厂钳工组，

没有我的名字,把我调到坭埧厂!我的头轰地一下子,心中十分难过,这是把我从电机厂开除了。

第二天晚上举行漫谈会,我发言表示了不满。蔡省三用一些我也能说的“大道理”帮助我,我根本没有入耳,心想,钳工组这么多人,把陈亲民、赵玉林、樊迅调出来,剩下的李介立、邬国贤,比我强么?这一定是因为修皮带的事,认为我不安心工作,而把我开除出钳工组。这些事与管教科没有关系,这事与关师傅有关。我一向对关师傅印象很好,不过这件事这样处理我不满意,他观察问题不全面。想来想去想不通,不想了。反正在哪儿都是改造,到那儿好好争取也有希望。但是一想,那里也是这些政府人员,心里未免打怵,但是不去是不行的,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9月13日,到了坭埧厂。衣科员宣布,由张林生、谢异炎两个学委负责(我不知道谢异炎什么时候当的学委)。一起劳动的有肖兆林、谭自平、王经五、任建冰、樊迅、秦铮。残、老、病、弱都集中在一起了。我与这些人在一起,我算落后分子了。不过也有好处,跟他们在一起没有重活,没有危险活,没有精密活。不言语,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看看再说。

头一天,抬土垫厂房,我与赵玉林抬一个筐,我对赵玉林说:“咱们是主力,要多干,干出汗,这里咱们不多干,谁多干呢?”他同意我这个说法。我们从3、4所的后院,把土抬到厂房,抬了一天没人管,我们累得够呛。晚上赵玉林咳嗽起来,我一听他咳嗽,心中便不安起来。白天我不应该和赵玉林那样抬,他有肺病,真的累坏了怨我不照顾同犯,与政府改造精神是不符合的。

厂房垫好,开始磨粉。把石头破碎磨成细面,送下一道工序炼坭埧。炼坭埧的有唐乐山等人。我不到那屋,因为那屋有电,去了怕出事儿。

9月16日我从磨粉调到坭埧炉,调去的有我、赵玉林、陈旭东、陈达、傅希章、谢异炎、周开成、张林生、唐乐山9人。我什么也不懂,只有唐乐山在这干了几天,张林生和谢异炎也知道一个大

概。我们才知道坩埚怎样的炼法。看了一个上午明白了，只是吹的时候要技术，别的问题在其次。这个活倒不累，只是管电门这个活需要特别小心，稍一不慎，即可造成人身及设备事故。这是新东西谁也不会，是由北院的师傅来教的。一个坩埚能卖几百块钱，赶上一部电动机值钱了。

坩埚生产分三班，每班一小组，三个人一组。我们这个组组长张林生，组员我与陈达。开始叫我管电门，陈达装炉。每天晚上，除了刘所长^②、值班的干部和医务室的干部不来，其他干部都轮流到坩埚炉上值班，是全所干部所关心的一个生产单位。在技术上说干部也都是陌生的。北院师傅来了一次，他虽然比我们有经验，可也不能够把生产上的道理说清楚，不是完全内行。

坩埚上需要的石头，由三所战犯到山上去弄。另外政府又派人到人民公社去买，去运，这些事都很麻烦。运到所里需要洗干净，大块石头破碎成小块，再送到磨粉车间磨成细面。磨粉车间有三四十人，每天磨粉几百斤。在磨粉中也发生不少问题，每天公布磨粉的数字，一些老头干劲也很大，不过也有干得不好的。比如任建冰，自己磨得慢，他就到公家磨粉箱里去偷成品，被人发现检举了。这些事都说明，为了争数量，不择手段，成了我们谈话的材料。

在坩埚炉上劳动的战犯都是电机厂调来的。赵玉林对我说：“你看，把一些特务都调来了：陈旭东、陈达、张林生、谢异炎、你、我，我们在这儿工作要小心哪！”我想，可能是把这些特务都调到这考验一下，如果不好好工作，就调到农园劳动。这时，我倒希望去农园，在这干活有夜班，白天休息不好，对身体不利。这里干活管电门，容易发生事故。果真发生事故对一个特务来说，就是现行破坏，要枪毙。我心中十二分恐惧，怎么把我调到这来了？这明明是要我的好看！陈旭东说：“这都是有用意的，你们不知道，这不是为了生产，面是为了改造我们……”

过了几天，调我装灯，由陈达管电门。我离开电门，心中减少了负担。只要政府人员不在，我们就凑在一起发牢骚：“咱们从电机厂

刷下来了，咱们技术不行，那好，叫他们干吧！”我拉长声说。

“舒靖南的技术也不比陈达好啊！”

“说那个干什么，身在改造之中，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哪儿还不是犯人。”陈达说。

赵玉林说：“前天有人说，因为技术不好才调到坩埚。关师傅否定这个说法。”

我没好气地说：“否定是否定，实际情况不是摆在这儿吗？周开成好吵架，陈旭东不顶一个人干活，你我又怎么样？”

“你比我强多了，修理这些工具，也需要钳工啊。”

我们当时都吸纸烟，一支接一支的吸，长吁短叹，唉声叹气，心中有说不出的别扭。这样的工作情绪怎能搞好工作？我真担心发生事故。在坩埚炉劳动的战犯的思想，我没有汇报，因为我就是有问题的人。这段时间，政府人员及战犯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产品上了，无暇考虑战犯的思想，可能看我们都挺愉快，其实这是假象。

干了几天停工修电器设备，我们转到基建干零活。一天贺知诗问我：“你们累不累？”“不累，没有事。”接着他谈到节约问题，我说：“吃稀饭，晚上尿太多。”他把4所节约的情形也谈了不少。我认为节约是有问题的，但没有与贺知诗详谈。因为他这个人我是晓得的，一贯胡说八道。对他说多了，传出去不可收拾，说了几句，我赶紧站起来离开了他。我当小工递砖，砌小炉那几间房子。我站在树上看见地上的胡光煮，便与他开起玩笑：“胡光煮，有一个京戏你看过没有？”“什么戏？”“树上老人！”开始，他没明白，看我站在树上才明白，他说：“树上老人我没看过，我看过树上孩子！”

说完了这句笑话，晚上睡了一觉，胡光煮第二天不会说话了。同时，孔海昆不能走路了。这些事发生得这么快！难怪“黄昏思想”在年龄大的战犯中普遍存在。

坩埚炉的电器设备修好之后，继续生产。每天王科长、贾科长都来，在坩埚炉一呆，就是一两个小时。我看王科长这个人很平易近人，蹲在地上看坩埚与我们谈话不拿架子，不装腔作势。我们对

他说话,从不考虑这句话应该怎么说?那句话是不是应该说?有人说:“王科长在部队干过,所以能这样平易近人,我们一辈子也学不了。”我一看王科长容易使人接近,便想找他汇报一下思想,又一想,劳动中还有别的犯人在场,就没有找。

有一天下午,王科长来了,正赶上出炉,唐乐山从炉里夹出胎就吹,吹得很大,王科长一看气够用了,忙喊:“好!好!”唐乐山不听还给气,只听“砰”地一声,炸个粉碎,玻璃碴子崩了一屋子……王科长一声没吱。别人说话了:“科长叫‘好’你不听,看看,挺好一个胎,炸了!”唐乐山感到很不好意思。

王科长说:“气够用了你还给,它能不炸吗?以后要注意,给气不要给多了。”别的什么也没说。唐乐山自己用笤帚扫玻璃碴子,心中很不好过。这种事在其他劳改部门绝不能这样过去,起码要批评一顿“为什么不听政府人员指导?”“这不是有意破坏吗?”但是王科长态度依旧很和蔼。

坩埚生产很不顺利,成品时好时坏,也找不到毛病。政府人员很着急,我们也很伤脑筋。崔科员到外边取了一些经,但是仍不起作用。每天消耗许多电,我感到情况不乐观,质量有问题,产品出不去厂,我们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个礼拜天,我们这组是白天的班,赵玉林、陈达和我三个人操作。赵玉林负责吹坩埚,他的个性很强,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结果吹坏了一个。赵玉林向谢科员报告,说了一大堆理由,但没承认自己不听别人意见。谢科员很不满意。正在这时,又出炉了,赵玉林赶紧操作,把胎从炉里夹出来,金班长在旁边叮嘱他不要慌,稳住架。赵玉林手忙脚乱地把胎从炉里拿出来,一吹“砰”地一声炸了!玻璃碴子飞到墙上,他的一件棉袄在墙上挂着,棉袄碰上火烧着了。棉袄一烧,房子也危险,我赶紧取水往墙上泼,火泼灭了,可是赵玉林的棉袄却烧了很大一个窟窿,不能穿了。这么一会儿闹得乱七八糟。祸不单行,下午5点钟的时候,谢科员和金班长又来了,又赶上出炉,赵玉林把胎夹起来,一不小心掉了!真可惜啊,谢科员

一见火了：“赵玉林，你要干什么？混蛋！你这是搞的什么把戏？”

赵玉林还想把这个胎夹起来，但已经来不及了。一个胎要炼一个小时，需要许多成本，他怎么这样不小心啊？谢科员这样发脾气，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谢科员当时也不过二十七八岁，没有在部队干过，在革命队伍里还不是老战士，当然不会炉火纯青。尤其与我们这些老反动派打交道缺少经验，遇到令人气愤的事发脾气是不可避免的，况且这件事很可气。我认为谢科员发脾气问题不大，就“混蛋”这两个字重了。

我记得1951年在长春公安局被押时，一个审讯员对一个犯人大喊大叫，审讯员的上级在背后提醒他：“这样能解决问题吗？这种斗争方式应当考虑！”事后我知道了这件事，并且记住了这位领导的话。在我当学习组长时，别的组长打犯人，我没有犯这个错误，其原因就是那位领导的言行对我发生了作用。

赵玉林的棉袄叫火烧了，又受了批评，晚上回来垂头丧气打不起精神，想不到当晚金班长又给赵玉林发了一件新棉袄！赵玉林穿上新棉袄，坐在床上，低下头半天没说话，我知道他的头脑很乱。

谢科员对坩埚生产抓得很紧，拟出“八定”的生产办法，对用电、炭精棒、粉子、风、时间等都作出了规定。这么一来，产品质量提高了，生产正常了，但是日子不多，因为产品不能出厂而停工了。

谁吃豆腐？谁吃豆腐渣？

改造12年第一次患病，可能与调工种心情不痛快有关。那天夜里当班，屋子热，外面凉，没注意感冒了，觉得头很沉，支持了一夜，第二天又支持了一夜，实在不行躺倒了。头昏，烧得不省人事，躺下两天，温大夫来了几次，到第三天给我吃流食，一吃流食我便知道病得不轻。我躺在床上不能起床，流食我吃不下去，太甜。解

放后,我喝牛奶从不放白糖,我不喜欢甜东西。可是流食都是甜的,一点也吃不下去,我只好喝水,一夜喝一暖壶开水。一所赵炜给我送饭,我有点不过意,说:“来点别的吧,甜东西我吃不下去,有没有面条?”

过去有人吃面条,所以我这样问了。他摇了摇头,我一想算了。我想吃几个鸡蛋,一想7所的鸡蛋有的是,我给班长写了一个条子,请求给我几个鸡蛋,也没有批准,我想不通。王仲模有病,要吃苹果、白糖,政府都给他买,我有病怎么什么也不行啊?我劳动得不好?

感冒没有好,又转了别的病,打嗝,一夜不间断的打嗝,这样打嗝能把人打死。温大夫一看,叫我到医务室,往喉咙注射。我感到很紧张,打了两针又吃了一些药片,打嗝停止了。虽然发烧,头痛没有好,但是打嗝停止了,没有危险我就放心了。不知注射的什么特效药?大概要不少钱?真是立竿见影。政府对我的病很关心,温大夫细心诊疗,这使我的心往宽绰上想了,精神也舒展了一些。

杨南邨不知因为什么病到医院开刀,国庆节前从医院回来了。

这年,中秋节与国庆节赶在一天,我能勉强下床,改善生活也能吃一点,但吃得不香。京剧活动我也没参加,只到大俱乐部看了一眼,精神还是提不起来。

我每天与杨南邨在院里晒太阳,与他聊天。他说:“我的病来得快,我还认为不会有危险呢,骤然疼得要命,大夫把我送到医院,马上给我动手术。多亏及时,不然,咱们见不到面了。这就是人道主义的具体表现,我感谢政府给我第二次生命!”

我对杨南邨说:“过去政府给别人治病,送医院你无动于衷,只有给你开刀了,你才感谢政府,是不是?”

“给别人送医院,我也感谢,但没有自己受到恩惠感激得深。”

杨南邨很善讲话,说起来没有完,他讲在医院怎么开刀、上麻药,像讲评词一样。

有一天晚上,没给我药,半夜我要吃药,便写了一个条子放在

小窗台上，等待班长来取，不一会儿药送来了。

“有开水没有？”我一听问话的是贾科长，他是在国庆节替班长值班。人在病中见到一点关怀都觉得温暖。这次贾科长亲自给我取药，使我感激万分。政府对我们的照顾是上下一致的。如果在反动派那里，阳奉阴违，各行其是，上级命令到了下边便打了八折。比如说在抗战时期，蒋介石下命令，抓到日本战俘要优待，叫“优待俘虏”，可是汤恩伯的部队抓到了日本战俘，怕解送麻烦，“砰”地一枪给打死了，士兵说：“谁说了算？老子说了算！不打死，给老子找麻烦，往这送往那送，要是中途跑了，老子还要坐禁闭，这么一下子都省事。”反动派就是这么乱七八糟。当然更谈不上科长替班长值班，科长亲自侍候犯人了。

很快我就搞明白了，我病中提出的要求为什么没能得到满足？因为粮食发生了恐慌，社会上都在实行定量，实行节约。我们在墙里面知道不那么具体，只知道要实行节约。

一天，刘所长把1、3、4所战犯召集到大俱乐部做了一个报告。前面是改造问题，后一部分谈到生活问题。他批评有人扔面包（段克文往污水缸里扔面包），又提出要节约，不应当浪费。全国人民都实行定量，毛主席都定量，你们也应当考虑这个问题。日用品呢，应该用的能不能少用？也应当考虑。

我们对刘所长这个报告体会不够，没有认真对待，照旧那么吃，日用品、纸烟，照领照吸，只有肥皂减了一些。我们基本上没有响应刘所长的号召，采取了应付的态度。

又过了几天，谢科员召集三所学习组长开会，对吸纸烟浪费感到不满，他说：“你们吸烟是从赌场上学来的？你们吸烟是从婊子那学来的？为什么不能戒？”又说干部才领4盒烟，一年才用几块肥皂。这些话，由各学习组长回来传达。我在3所44室，是学习组长尚传道传达的，我知道纸烟吸不长了，戒还是不戒，我迟疑未定。

第二天下午收工，我看墙报上贴出刘庄如写的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实行戒烟，不领烟的保证。于是我到学委会问刘庄如：“不能吸

了？”他一摆手，我就知道了。晚饭后，我第一个写大字报响应不领纸烟，并且提出：一年6块肥皂，3包牙粉。随即各室也都动了起来。但是仍有一些人坚持不戒烟，如黄鹤、张三民、樊迅等，然而多数吸烟者已不领烟了。

关于吃的问题，据说衣科员每月才27斤粮，于是我们也要求定量。也不知是学委会搞的，还是有积极分子鼓励，定量的这股风刮起来了——我们自己给自己定量，有定30斤的，有定35斤的，有定40斤的，形形色色，都是自己贴大字报宣布的。还有的写：大米饭一平碗，而包早晚各一片、中午两片……这时期各屋吃饭，互相监督，执行定量，多吃不行。我定30斤，早晚只吃稀饭，不吃面包，中午两块面包。吃了两天，我感到有点受不了，别的屋子有了反映，不满情绪随即变成了怨言，有人说：“如果定量，而包块大小都要切匀，不能大的大，小的小。”

“大米饭要用一样的碗来量，袁剑飞那个碗有洗脸盆大，二斤米装不满。应当划一，以免不标准。”过了两天，谢科员纠正了这些事情，不准互相监督，自己吃自己拿，别人不准问，谁如果干涉就犯错误。

在定量的几天里，发生了一些令人寒心的事情，比如张严佛多拿了半块面包，生活组长杜彦兴看了他一眼，他又送回去了，他背后说：“唉，为了吃半块面包，叫人看了一眼，真难过！”

肖抱愚是3所45室生活组长，他订28斤，叫别人也不能多订；陈远湘是小炉的，也订28斤；谢异炎是坩埚的，也订28斤。这样一来，全屋的人都不满肖抱愚，有人怀疑肖抱愚这样做是学委会的指示，进而也怀疑学委会是受政府的指示。经过谢科员一纠正，才知道是他们这些人从中鼓动，引起了不应该有的波动。

有一天，4所学委会召集生活组长开定量会议，正赶上刘所长去了，一听研究定量，所长说：“政府对你们保证吃饭吃好，注意节约，不浪费就行。”虽然这样指出了，4所的学委会仍然告诉各小组施行定量。各小组把定量数送到学委会，衣科员说，劳动好的可

以多加一些。上山劳动的时候，姚轻松在走廊里大喊：“上山的同犯可以多吃一块！”

究竟是怎么回事？4所的战犯也不明白。又过一段时间，这种现象才被纠正，大家都说学委会从中搞鬼，给姚轻松起了个外号叫“坐山雕”。

关于吸烟的问题，姚轻松在学委会说：“纸烟可以报领，干部每月才5盒烟，你们看着领。”

这样一来，吸烟者只得每人领五盒，许多人都感到不够吸，背后发怨言，胡汉文对我说：“我领6包，生活组长叫我考虑考虑，每天吸4支烟，再考虑就不叫吸了！唉，真没办法。”

11月，王科长在大俱乐部召集1、3、4所的战犯开了一个大会，由王科长做报告，讲节约问题。他说，我们吃饭是不定量的，政府叫我们吃饱，但不要浪费，也不要限制，更不要互相监视。听说4所吃饭还规定数量，这是不对的。以后，该吃多少就吃多少，只要不浪费就行。说得非常婉转。大家一听，心里都想到全国人民定量，只有我们这一小撮战犯不定量。于是产生了感激政府的心情，心里颇感不安。接着王科长又谈到吸烟问题，王科长说：“5盒烟是不够吸的，那么10盒烟够不够吸？”台下的战犯很快就有人答复：“10盒烟够吸了！”王科长说：“好，那就先发10盒！”

吸烟的问题也解决了。从大俱乐部散会回来，大家喜笑颜开。我们感到政府这样照顾我们真过意不去，尤其是王科长那样的讲话，和蔼可亲，足以代表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我们的父母般的照顾，使我们的心暖暖的，形容不出来内心的感激。

过了两天，虽然没有领纸烟，但是我们收工回来发现，凡是吸烟的战犯床上都放了一条纸烟。我们3所44室，只有樊迅把烟留下了，其他的人都把纸烟退了回去。因为我们已经发表声明不吸了。我想干部才领四盒纸烟，在节约时期我们能省就省，吃饭都应该少吃，为什么烟不能戒呢？如果不是战犯，还另当别论，可是我们是战犯哪！不应当不自觉。在解放前，我吸食鸦片，注射吗啡……

吸纸烟必须是什么牌子的,否则不吸。当时如果不这样不够派头。如果拿起什么牌子的纸烟都往嘴里搁,叫人看见笑话。从小在东北吃豆油长大的,1947年回东北就不吃豆油了,硬说吃豆油恶心。这种忘本的作法,居然有许多人说:“东北的豆油不如关内的小磨香油吃起来香。”回头一看,感到非常可耻。现在吃豆油也不恶心了,不吸纸烟也行了,一切坏毛病都可以克服。鸦片能不吸,纸烟也能不吸,现在是节约时期,不要给人民额外增加负担,等将来自食其力的时候再吸也可以。况且,我对吸纸烟引起火灾也很害怕。记得7月一天晚上,我们都去洗澡,张禹斌把纸烟头放在床底,结果把褥子、床板都烧了。第一个洗澡回来的孙焕彩一走走廊,闻到一股烧布的味道,挨户一找,找到我们这屋张禹斌的铺位,孙焕彩把火给扑灭了。张禹斌挨着我,我也吸烟,如果我们这条铺都烧了,或者我们这间屋子都烧了,责任算谁的?这次孙焕彩在张禹斌的铺位上把火救灭,而他坐在上面,不叫人看,说:“没有什么,烧得不大。”这些人生活非常散漫,烟头随便扔,如果不戒烟,早晚要跟他们吃亏。

在节约时期,我们知道干部粮食定量不多,我们吃豆腐,干部食堂吃豆腐渣,并且吃树叶子做的代食品,即或吃这些东西,还千里迢迢驱车去内蒙古打黄羊……这些事很快就被我们知道了,大家谈起来很受感动。

“人家是人民功臣哪,还吃树叶子,我们是人民的罪人哪,还吃白面,于心何忍!”

“我们吃豆腐,干部吃豆腐渣,按理我们应当吃豆腐渣,干部应当吃豆腐。”

岂止是吃呀,我想起8月浑河涨大水,政府一方面保护电机厂,一方面关心我们的安危,调查我们谁会游泳,不少战犯报了名,又安抚大家不要惊慌,准备把我们迁到安全地带,可是政府人员的家眷却没有人照料。想到这儿我说:“我们不能吃树叶子,因为我们没有那种水平,没有那种与人民共甘苦的优良品质。思想上没有那种较高的境界,焉能有正确的行动!”接着,我联系了自己的罪恶,

1948年5月以后,长春粮食缺乏,我从政治犯身上打主意,先吃干饭,后吃稀饭,再喝米汤,最后吃糍子,饿得“犯人”走不了路。可是今天呢?全国定量,大人孩子定量,我们战犯不定量!干部吃树叶子,我们吃大米白面!对比过去,再看今天,心里不能没有许多的感触,不能不承认这是共产党以德报怨!对我们特殊的、破例的照顾,期望我们加速改造。

在节约问题上,开始发生的偏差,是我们擅自搞的,经过政府人员的纠正,错误的现象消灭了。进而看到,干部的艰苦奋斗精神,对比我们的生活,深深感激政府的关照。

穷 欢 乐

11月中旬,有几天没来报纸。26日晚饭后,谢科员召集学习组长会,传达了刘少奇主席发布的特赦令,并且把报纸交给学习组长,回组传达学习报上刊登的特赦令。传达中各小组接连不断地响起掌声。战犯都希望自己能特赦,也有入监不够十年的,“在黄鹤楼上看帆船”,但是心情都是一样的:多多益善。即或这次出不去,由于越走越少,自己越有被赦的可能。

我估计这次特赦不会有我,因为我这一年改造收获不大。如果同第一次赦的人数那样少,我根本不要想,但也有侥幸心理,一种矛盾的心情交织在身。

政府从头次特赦取得经验,这次尚未等战犯的思想波动起来,在传达的第三天,就召开了特赦大会。开特赦大会的这一天,还是穿新棉衣进入大俱乐部。关在单间的姚步烈不允许他去参加大会,专门为他安了一个扩音器,放在三所学委会的窗前,正对着姚步烈的46室,这个屋子原是我们写材料用的,8月份关姚步烈,他一个人给占了。姚步烈是“橡皮碉堡”刀枪不入,任何教育都不能转变他

的既定想法——一定要结婚^③，姚步烈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在3所交罪时，他胡说有人打他，现在还是乱说……这么胡闹不想出监了？这不是自取灭亡吗？政府如此关心每一个战犯的改造，令人感动。希望姚步烈听到特赦的消息能够猛醒。

这次来采访的记者比第一次特赦少多了。被特赦的有张普林、陈庆斌、欧阳午、高广荣、庞铮、冯国典、陈芳芝等人。这次还有十多个改判的，原来是死缓或无期徒刑，这次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或18年。

特赦大会后漫谈了三天，漫谈中暴露了许多错误想法。有人认为被特赦的战犯改造得并不怎么好，尚传道说：“我看欧阳午与我差不多，有些地方还不如我。”

“我看这次特赦过于照顾山东解放团来的，他们7个人就特赦一个。”

“还有南京来的也多。”

“我们这里没有特赦一个特务，难道这么多中统、军统，一个改造好的也没有？”这是特务战犯的想法，我也是如此。

“这次特赦的都是有家有业的，如果没家没业，一个人无所归宿容易出事，这也是一个条件，不相信，你们看嘛！”这是赵玉林的看法。

“这次特赦小的多，少将的少，陈芳芝、高广荣、冯国典、庞铮、张普林等人都是上校级，放小不放大。”

有许多错误想法，但比第一次特赦好多了，情绪还比较正常。

改判减刑的对“减刑为有期徒刑20年，由改判之日起”有争议，这么一算，还要加20年才能出监，现在60岁的人，到80岁才能期满！悲观了，发牢骚了。周上凡说：“早知这样，还不如不减刑呢！”为此，王科长还专门找减刑的战犯开了一个会，给他们打通思想。

平心静气地讲，特赦的张普林、高广荣、陈芳芝等人，是我们所公认的进步战犯，个别人不服气那是存有私念，一致认为政府特赦

是公平的。受两次特赦的鼓舞,“老死监中”的错误想法消失了,大家明确,只要关押已满十年,确已改恶从善,就有特赦的可能。

过了新年我们开始准备春节的文娱节目。今年社会上大搞文娱活动,用以弥补物质上的不足。我们战犯的文娱活动也比历次搞得热闹。

衣科员到街上买来五六十本文娱剧本,数量之多大概是把书店所有的剧本都买来了。

一天晚上,我、胡汉文、于泽霖在广播室谈京剧问题,刘所长来了,他询问京剧活动的情况,特别向胡汉文了解了山东解放团改造中的文娱活动。胡汉文对这里的生活感到满意。后来所长问我们演出还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靴子,每次演出都是穿胶皮靴子,现在胶皮靴子已经破了,穿着上台不好看,应当发一点布,我们自己做靴子,这样就解决问题了;再有,唢呐现有的吹不响,应该买一个或换一个;其次是晚上有演出任务的,晚饭时不敢多吃,怕吃多了唱不出来,最好准许留晚饭,演完戏回来再吃。”正在这时,郝事务长来了,所长便指示郝事务长,发给京剧组几尺黑布做靴子,又叫郝事务长到街上买唢呐。关于唱戏吃晚饭的问题,所长说可以通知大厨房给准备一些面包。这几件事全解决了,京剧组感到很愉快。我把所长的关心,对京剧组的同犯们一说,大家说一定把戏演好,活跃我们的文娱活动。

我们搞文娱的战犯,排定节目送上批准,然后派角色。我主要演出京剧与相声,其他一些小节目也参加演出。这次3、4所大多数战犯都参加了文娱活动,只有极少数是死角。每天晚饭后,集合到大俱乐部排练。这时候,大俱乐部就像庙会似的,有唱二人转的,有跳舞的,有演话剧的……台上排京戏,角落里对台词,锣鼓一响,台词听不到了……有时一个人又演话剧,又演京剧,这边叫他去,那边也叫他去,话剧与京剧矛盾了,剧务与剧务冲突了,一边排戏,一边辩论……整个大俱乐部十分热闹。我感到头昏眼花,特别疲乏。

春节到了,院子、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走廊里挂满了花环、灯

笼,政府照例下发了苹果、糖果,人们感受到了节日的气氛。除夕文娱晚会是摆地摊演出,就是把大俱乐部的椅子摆成圆圈,中间成小广场,节目在小广场演出,战犯们在周围椅子上观看。第一个节目是我们小组的快板剧《上北京》,我扮一个老太太,小组的犯人都参加这个剧的演出,这个快板剧很热闹,看后叫人兴奋,所以贾科长把它放在第一个演出;接着我演相声,还有7所的舞蹈,日本战犯一边唱一边舞,很精彩,演到11点才结束。晚饭时,有人说:“今天是年三十,少吃点,半夜还有饺子呢。”

从大俱乐部回来,通知马上睡觉!大家知道今年三十没有饺子吃了。我知道这是因为节约,困难了。其实吃完饺子再睡觉更不舒服,再说我也没有感到饿。但是有的人露出了失望的样子,特别晚饭吃得少的樊迅,这回怕是饿了。大家什么话也没说就睡了,我想,只有等待明朝了。

第二天大年初一,一起床互相问好,洗完脸就张罗化妆,准备饭后演出,担任演出的人忙得不闲,管剧务、化妆、道具的特别忙。

早饭吃上了饺子,我以为是黄羊肉的,不是,是猪肉馅的,挺好吃,每人都吃了不少。我想,干部是不是也吃上了饺子?从大厨房挑饺子回来的同犯说:“干部在大厨房给我们煮饺子呢!”那么干部吃没吃上饺子呢?不得而知。

饭前化好妆的,因为吃饺子弄得嘴巴全是油,又重新进行了补妆。一切弄好了,开演白天的节目,一直演到吃晚饭。

衣科员指示下午5时演出京剧,到时演不出就要受批评,过去常受到这样的批评。因此我抱着宁早不晚的主意,下午一时就开始化妆,晚饭前把妆化好。我知道带着妆吃晚饭不舒服,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这样不行。本来到了年节,都希望吃点好的,可是演戏饭前化妆,脸上抹了一些白粉,吃好东西也不香。为了演出,大家把不愉快闷在心里,不过有一些愿意演戏的如胡汉文、魏季良等人倒不在乎,胡汉文把晚饭留下来,放在茶楼的大水壶上,等演完了戏再吃,而谭冀平、靳金城、蔡省三演戏不敢多吃饭,炖肉也顾不得

吃了。

晚饭后，我赶忙叫服装组给演员穿衣服，有的在厕所大便，我也去催。这些人也够磨蹭的，3点钟晚饭，吃完饭3点40分，再上厕所就4点多了，5点开演，怎么来得及？只好催这个催那个。到5点钟，不管准备好没有，把队伍带到大俱乐部……迎头遇上王仲模，他催促道：“关梦龄快一点呀！”

“好，你快去找蔡省三！”我扭身就跑。

“蔡省三穿上衣服了，他叫我找你，衣科员催呢！”

“好，好，大家快一点呀！你叫曹琦戴头盔，你找王云沛去，穿那件绿靠！”

东一头，西一头，把衣服穿好就开戏了。开戏时我在上场门一站，担任催场、提词、维持台后秩序，一直到演完为止。有许多时候后台吵起来，衣服穿差了，演员没开水喝，道具没准备好，连黄鹤扮太史慈忘了戴胡子上场都是我的问题，他们一齐向我发泄怨气。

演完戏，班长叫我到厨房去拿烤面包，无疑这是所长指示的。正在吃面包的时候，所长从走廊走了过去，看我们吃上面包没有，这个情景别人不清楚，我清楚。我对姚轻耘说：“面包挺多，叫后台的职员也来吃一点吧。”

于是管服装的、监场的、打锣鼓、拉胡琴的，都来吃了。

一连三天文娱演出，白天晚上一齐演，共演出130多个节目，是我到战犯管理所演出节目最多的一个节日。大家说：“我们也是百花齐放，什么角色都挖出来了，有一些从不上台的也上了台，表示大家都很快快乐！”

欣慰

赶写特务技术材料，这是去年8月刘所长布置“特”字号（战犯

对我们这些中统、军统特务的称呼)的任务。写材料我从没有抵触,因为我知道我的一切都是写材料争取来的。可是由于姚步烈占了我们写材料的屋子,我们没有专门的地方写材料了,因此思想不够集中,写得不够连贯,4月25日呈上去二百多页,自己看了也不满意。

5月有一天,刘所长又召集我们“特”字号的战犯在前楼会客室谈话。所长就写特务材料一事,读一份文件。我虽然距离刘所长很近,但是由于我的眼睛近视,看不清文字,听文件的口气是一个权威机关叫我们写的,要求写全部的特务材料,过去已经写了还要写,今后再也不写了。所长把内容念了一遍,又加以解释,最后问我们需要多少时间?张严佛说:“需要一年。”施锦说:“需要一年半。”我说:“要半年,如果是整天的写,而不是一天两个小时,那又不同了。”关于时间方面由所方给安排。在漫谈如何写材料时,张向阳说:“我在军统局住了几年禁闭,关于军统的事我知道得太少,写不出东西。”我对他这种说法不满意,别人也不满意,大家发言不提名地批评了他,我想,这个顽固蛋一点也不争取。他在1945年“九·三”胜利之前,在西安第3中美训练班当上校教官,担任政训工作。中美训练班的事有很多可以写的,他说写不出东西来,令人奇怪。

我想起从前写类似材料的经验,建议道:“这份材料如果集中写,能写出一部完整的東西,否则一个人一个人写就分散了,编辑都困难。我过去在长春公安局曾参加集中写军统材料的工作,那份材料写得比较准确、丰富,今天如果再集中写,有这么多的人,一定能写出一份更完整的特务材料,如果不这么写,以后这些人一调开,就不容易写了。”

所长想了想还是叫个人写,不集中。我判断这份材料是公安机关用参考的东西。参加的“特”字号的战犯有王业鸿、黄康永、鲍志鸿、张严佛、刘非、陈旭东等人。他们都能写出一些真实的东西,唯有王安之不行,这个人已年迈昏聩;陈达、钟化民、黄玉元、张林生、潘澄清、谭容等人,因为从事特务时间少、资历浅,不会提出可用的

东西，不过他们可以把他们所在单位的材料写出来。

晚上又漫谈，谢科员进行了动员，王科长作了指示。这时对于写这份系统的特务材料，大家都有了足够的重视。我与王科长说：“我们用的纸是黑纸，太不好写，能不能找一点好纸？”王科长答应想办法。会后，王科长找黄玉元谈话，回来黄玉元笑了，我判断可能黄玉元有负担，科长对他作了工作。我知道黄玉元没有什么可写的，他只是一个上尉报务员，1949年在“包围圈”里才升为少校，莫说与老牌特务张严佛比，与我也比不了。

5月中旬开始写系统材料。一天一个不认识的干部找我谈话，能随便到监号提人，是公安机关的人，具体一点说，是辽宁公安厅的人。他领我到办公室，拿出纸烟给我，我说不吸烟。这个人有二十六七岁，问我写材料没有？我说已经开始写了。

他问怎么写的？我说按照所长指示写的。他又问所长怎么指示的？我说有三点，一边说，我一边掏出笔记本，他说：“给我看一看。”我对所长指示记的条理分明，他看完很满意，我想，昨天所长念的那份文件可能就是他们带来的。他对写材料进行了一些启发，问我有什么顾虑没有，他又问我开始从哪儿写起，我说从我加入军统时开始写。

“我看你从东北地区开始写吧。”

“那也可以，我从沈阳写起。”

结束谈话回来，学委会传达东北地区的特务先写东北的特务情况。我断定找我谈话的干部是辽宁公安厅的，而其他“特”字号的战犯仍写供职地区的材料。我、陈旭东、康健东、段克文、钟化民，先从东北写起，后来，又传达给鲍志鸿、张严佛等人，从1945年“九·三”胜利时写起，这是要了解解放战争时期的特务情况。

上下午都写，不出去劳动，这么一来我担心身体不好，优点不鲜明。因为我们在这里写材料别人不了解情况，只有劳动大家才能看得出来好坏。写到130页，这个干部（后来知道他姓张）来到监号，亲自把这些材料拿走了。这期间他们有四五个人住在这里，每

天找人谈话,每天来要材料,与管理所的干部一样,随随便便,进进出出。

一个礼拜天,我们京剧组在大俱乐部那儿练唱,一个索要材料的高个的干部走过来,当时我正在唱,唱完发现他站在我的身旁,他说:“关梦龄你唱得很好!”我笑了。他问了许多京剧组的活动情况,这时正赶上我们京剧组把所有的演出服装拿到外边晾晒,我就对他说:“这些服装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没有一件是买的,如果不在跟前看,绝对不会看出来是画的图案,如果买这么些服装,那需要很多的钱呀。”他称赞道:“真不少,一个小戏院也不会比你们多,真了不起,你们的人才很多呀!”

我说:“这只能说明我们这些战犯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改造教育下,思想有了转变,精神愉快才能有情绪参加文娱生活,如果在解放前,别说上台演戏,看戏都不一定赏光。现在我们的话剧和京剧都很活跃,有许多人想上台演出,还没有机会呢。我们是乐观改造。”

“好啊,乐观改造。好好争取,争取特赦!”

“我想争取第三次特赦。”

“努力吧。”

张干部非常关心我写的材料,对我很了解,有时就坐在我身旁,看我写材料。我想,他一定急于要沈阳地区的材料,我把沈阳地区的东西尽量写详细一些。我在沈阳认识一个李友三,他当时在沈阳邮政总局工会当主席,1947年夏他找我,要求我给他们派几个特务,协助他们防止共产党渗入。当时,我忙于私人应酬,没有给他派人,后来,他是否又找别人要求派特务,不得而知。因此我把李友三写了出来,这是一个检举材料,另外又写了一些沈阳地区的组织材料。有一天我写社会关系,写到张冠英——鲍老太太,她是张学良的胞姐,张干部指着张冠英的名字说:“把她的情况写详细。”

这样写,写到8月30日,张干部一共拿走东北地区的特务材料815页,随即他们就离开了管理所。这些材料可能会起到作用,

只是我难以像在吉林、长春那样直接看到我的工作成果。不过在写材料期间,我和大家十分欣慰地看到了我们的另一成果。

5月,政府组织我们参观了“辽宁工业展览馆”。新建的展览馆十分壮观。

这个展览馆展出的机器都是辽宁各厂生产的。大型机床,巍峨挺立,看过使人感到我们国家在蓬勃前进,值得骄傲;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刺绣、雕刻、绘画,都非常精致。我过去认为刺绣只有川绣、杭绣,别的地方如辽宁省根本谈不到刺绣,女人绣个枕头花可以,绣个大幅精致的东西不行。今天一见,出乎我的意料,可见用固定的眼光看事物是不正确的。

参观时,战犯对电动机非常注意。我们战犯制做的电动机,也在这里展览!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进入了显赫的展览厅,大家心中都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许多人在这部电机上付出了汗水,面对自己的劳动成果不能不感到欣慰。

由于参加了战犯管理所电机厂劳动,我们对一些机器及部件都大致了解了,再不像1957年参观那样,只看大,只看新,其他什么也不懂。懂一些常识参观起来就更有兴趣了。比如摇臂式的钻床我们明白,大砂轮、小丝锥更熟识……虽然我在电机厂劳动没学成哪一门技术,但是我增长了不少知识。

此后,我利用时间继续写军统系统的材料。张干部仅拿走了815页,还有一半没有写,再写,恐怕时间成问题。

病的包袱

政府人员曾经批判李邦勋“老死监中”的思想,但是随着岁月的增长,战犯们身体上的病患越来越多了,于是政府方面又及时地作了大量的保健工作,其无比的关怀是令人垂泪的。

这里每年一次身体大检查,此外,还针对战犯较多的病例进行专科集中治疗,如牙病、痔疮、疝气、梅毒等。解放前三十三年中我才检查一次身体,那是1938年入战干一团政训班。其他就顾不得了,也想不到这件事。现在做了战犯,居然有人关心我的身体健康了。

去年节约时期,依然请来医生给我们检查身体。这次我希望能给我镶牙,到了牙科大夫那儿,给我拔下一颗大牙,但是不能镶,我说吃饭不方便,他仍说不能镶。我想这是所的指示,只管拔不管镶,所里的温大夫也无能为力。过去段克文的牙为什么能镶呢?赵金鹏的牙为什么也能镶呢?我心中明白了,现在节约了。战犯百分之八十的牙有毛病,都镶牙行吗?站在政府方面想,只要你们还能对付吃饭,就可以不叫政府增加负担,站在我们这方面想,只要能吃饭,虽然有困难也要克服,不能给人民增加负担。在认罪上应该这么想:“为什么枪毙那么多的特务,不枪毙你关梦龄?”镶牙一桩小事攀比别人就不应该了,再一想,冯国典一个牙也没有,特赦之前,由政府给他镶的满口牙。人家平时能克服,我怎么不能克服。并且,像我这样情形,说我的牙坏得厉害,还要用许多话来解释,也感到麻烦。

在检查身体的时候,发现有些战犯的小腿肿了。所方对这个病很注意,凡是有这种病的停止劳动,上午参加学习,下午在屋睡觉,并且吃营养饭。每天三餐豆浆、细面包、豆腐、鱼。大家说这是心脏病,我认为是营养不良。不然为什么给他们增加营养呢?许多人认为这点小病留在家里不应该。医生嘱咐静养,蔡省三却在屋里看小说。这些现象发生后,政府便把休养的人集合在一个屋子睡觉,这样才比较安静地休养了。少数有病的同犯感到过意不去说:“我好了,腿不肿了。”结果到医务室一诊断,并没有好,还要休养。战犯普查了几次,每次有痊愈的,也有新患病的,前前后后共有四五十人被停止劳动,进行休养。这些患者都相继恢复了健康。

去年政府还给战犯治了一次梅毒,梅毒俗称花柳病。旧社会在

大都市里,患花柳病的太多了,尤其是反动派的上层,老爷、太太、小姐,没有患花柳病的不多。男女关系一团乱,有的太太就是高等破鞋。加上妓馆林立,造成了都市花柳病院特别多。解放以后,颁布了婚姻法,取消了妓馆,取缔了破鞋,男女不能胡搞,都有职业,实行一夫一妻制,花柳病逐渐的就少了,将来这种病将会消灭。这是共产党给人民带来的好处,这是共产党给战犯带来的恩惠。有梅毒的战犯每天到医务室注射,大家又说了:“在旧社会狂嫖乱赌得的下流病,早不治,晚不治,到了新社会由人民政府来治,政府对我们真是包下来了,包治脑袋里的病,包治身上的一切病,不感激政府就没有良心!”

我记得1942年我被调到重庆受特务训练,我们的特务训练班叫“军统局视察人员训练班”,一省调一个去受训,总共29人(原来是30人,有一个坐飞机失事摔死了)。班址在杀杨虎城将军的白公馆前面,靠着戴笠住宅只有一百米左右,有时戴笠在屋里骂人,我们都能听见。这时,我患了梅毒,训练班设有美式医务所,我不敢去诊疗,怕戴笠关我禁闭。我自己偷偷到街上小医院去治,用的是化名。当时我对戴笠只是怕,并不恨。可是现在回忆起来,却感到他太可恨了,他患梅毒由专用医生治。在这样主子的领导下,下属的特务机关乱七八糟,甚是肮脏。今天呢,战犯的梅毒重犯,政府包治,并且医务人员十分尊重战犯的人格,没有人说“这是花柳病啊,脏病啊!”之类的话。

今年3月,赵玉林调到电磨给干部生产代用的“面粉”。这时赵玉林已经吐血了,他的肺病十分严重,他对我说:“我的病吐血了,怎么办?”“不要客气,你要报告张大夫(当时张大夫负责磨粉车间的工作),因为你是给干部加工吃的东西,有这样的病不相当,这不是不积极的问题。”他听了我的话,就报告了政府。

4月29日这天,我们刚吃完早饭,正预备提纲发言,门外喊:“赵玉林!科长找你。”不一会儿,王科长就与他一块到了3所44室。赵玉林进屋显得很紧张,匆匆忙忙整理东西,王科长很和缓地

说：“赵玉林到疗养院去养病，可以不传染大家，他自己也可以得到很好的休养。”这时，赵玉林出去拿东西，王科长对大家说：“赵玉林很紧张，他不明白政府的意思，到那边疗养比咱们这里条件好。”

我与赵玉林的肥皂还没分呢，我说：“你都拿去吧。”赵玉林坚决不要。王科长问怎么回事，大家说两个人一块肥皂，王科长对蔡省三说：“肥皂不用两个人一块，一个人一个月一块。回头你告诉学委会，每月一块，天气太热半块肥皂不够用。这块肥皂给赵玉林拿去，你们再领。”

肥皂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从王科长的谈话发现，我们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政府方面有许多不知道，是战犯自己搞的，如牙粉节约，肥皂节约等。

赵玉林走了，我们感到政府既照顾了他，也照顾了我们，这样处理很全面。但是大家担心赵玉林在铁岭医院疗养胡乱想，他这个人个性特别，想法也特别。“五·一”前我们劳动，他说：“‘五·一’劳动节是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我们‘五·一’前应该劳动，劳动也不应该超过八小时。”

监狱中的人只要一调动，不论这件事有多么好，起初都要瞎想一阵，过几天才能安定。我体会到，我们这些人的心好比手表里的游丝，只要有一点轻微的颤动，游丝就会有感觉而晃动，这几乎是普遍的现象。

过了一些天，接着赵玉林之后，又有郭树人、范玉林、李文开、潘立强、叶芳华等人，去铁岭疗养，听说他们也是肺病。这些人旧社会生活腐化，加上年龄大，患病在身，不好医治。如果在家，这些人会早早死掉，在这吃细粮，不断地吃药，没有劳动，在屋里静养，等于养老院。我们参观抚顺工人疗养院，除了政治身份不同，他们有自己的自由之外，在物质方面没有我们这里好。所以，一所的犯人王贤伟对我说：“韦焕章在这病倒，他儿子来了不往家领，因为领到家里养活不起，又是牛奶，又是流食，谁家能有这么些好吃的。”

我看许多战犯在这里还能活下去，真若是放回家就完了。像王

光复有肺病,脚背经常浮肿,在这不断吃药,是医务室的“老主顾”,回家吃药怎么办?别说没有钱,就是有钱是不是就能买得到呢?办不到的,并不是说人民的生活不如过去,正是人民的生活好了,许多物质才感到不足,就要有计划地供应。

6月份,3、4所调号,把患肺病、肝病的战犯集中起来。3所的战犯身体比较好,4所的就差一些。调号之后,我被调到3所50室。

调号之后,3所没有思想波动,4所的战犯思想波动很大。比如陈达、姜明文、陈廷琪、谢异炎、杜彦兴等人,过去都自认为身体健康,经过一调号,心上有了负担,对自己的前途发生了怀疑:“这样的身体,不能劳动怎么改造啊?”

方舟对我说:“你们对我们调到4所高兴?幸灾乐祸,下一次你也要来了!”

这样的玩笑开得不应该,反映了个别战犯没有认识到政府这样做,对大家都有好处,这使政府人员又做了许多说服工作,才使战犯们扔掉了病的包袱。

调号之后,张严佛调到50室,与我住邻铺,没有事常与他谈论军统的事情,我对军统的内幕知道的不如他多,他对外勤不如我内行,我问他:“你在局里面当主任秘书的时候,怎样维持生活的?”

“靠薪水,不够就从经理处借,再就是有人给我送钱,没饿着。”

我一听,他的生活比外勤人员苦多了。外勤特务在处面独挡一面,可以向银行借款,搞投机倒把,雇一个买卖经理,不担名义,人不知鬼不觉,生活根本没有问题。我告诉他:“1943年我在陕西安康当查缉所长,分担11个县的查缉私货任务。我与中央银行安康分行经理合伙找一个货栈经理给我们走私。我们从安康把盐运到老河口赚一倍,回来买纸烟又赚一倍,20万的盐,运回来80万,坐在屋里什么也不管,就把钱赚了。有一些人贪污部下的薪饷,吞搂办公费,那是最下的办法。所以,做外勤的特务,不愿回到重庆做内勤。1945年‘九·三’胜利,戴笠在北平决定‘裁弱留强,里外三

百’，把弱的、不好的人裁掉，把好的能干的留下，把军统局的内勤人员调做外勤三百，把外勤的人调回做内勤三百。当时我一听就害怕了，怕把我调做内勤，吃饭成问题。”

“你们做外勤的痛快极了，做内勤的在抗战时期，每天白天8小时办公，晚上还得加二三小时，整天不闲，吃得又不好，许多人得了肺病。公事多，一千多人办还忙不过来，我的办公桌上经常堆满了待批的公事，公文一多，外边来人都看不见我了，叫公文给遮上了。有一些公文看了一个大概，拿笔就批，有的事我批过去就忘掉了，那才作孽呀。”

军统局的人虽然这样苦，可是特务头子戴笠却非常享受，张严佛说：“戴笠吃得特别好，比蒋介石吃的都好。他用的东西，从美国运，每天不离女人，给女人买东西，用的钱没有数，你给他在北平办过总务，你还不知道。”

“知道，在北京时更腐化。”接着，我对张严佛说，“你可以把戴笠政治方面的材料写一些，比如蒋介石叫戴笠暗杀某人，对哪一省军阀如何收买？怎样利用？”

写系统材料，张严佛比陈旭东写得多，态度认真，不过有许多他经手指挥特务暗杀的案子，他说不清楚了，如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宣侠父，就是他与蒋鼎文决定之后，呈请蒋介石批准暗杀的，这个案子，他不能详细的交待出来，他对我说：“暗杀之后，由李汉亭把宣侠父的尸首扔在一个井里，以后我记不清了，伤脑筋。”

他还很伤感地对我说：“我与任建冰在武汉公安厅的时候，武汉战犯启程来抚顺，公安厅副厅长想把我俩留下，说在武汉解决问题，打算释放我们。后来又变了，1958年移送到这，到这儿就成了战犯！”接着他告诉我参加和平起义，与程潜、陈明仁等人的关系，最后一摇头：“起义的思想到这之后解决了，现在我认识到我是战犯，我参加和平起义是假的。”

第三个特赦令

1961年。夏天来到了，西红柿已经成熟，院里种的西红柿一批一批摘下来，发给大家吃，政府还给买了一些甜瓜。大家吃得很有兴味儿，没有想到政府会给我们买甜瓜，出乎意外地发到监号。大家一边吃，一边谈，有人对我说：“你们东北还有甜瓜，真了不起。”

我开玩笑说：“这不是我省的，这是汉口的，过去东北这个地方什么也没有，我们都是喝西北风长大的。自从你们来了，才有了粮食，才有了甜瓜。”大家都笑了。

这一天夜里，厕所的门不住地响，有人泻肚。别的号有人向班长报告什么，不一会儿监房的门打开了几个。我从梦中醒来，一看，我们这屋就有五六个人泻肚，别的屋也是如此。过了一会儿大夫拿来药，管泻肚的，都吃了两片。吃完药还有泻的。这么一搞，3、4所就有几十个泻肚的。我心想，千万别出事，本来有许多菜可以生吃，但是在我们这里都要用水煮，比如黄瓜医务室不同意生吃，只好喝黄瓜汤，什么味也没有了。这么一出事，夏天就别想吃水果。

第二天，有许多人没有起床，早饭也有许多人没吃。3所每个屋子都有几个人躺在床上，肚子依然疼痛。这件事成了人们谈话的材料。早饭后，班长把西红柿、甜瓜等没有吃完的水果一律收起来，送到3所54室。这步棋我早就料到了。

医务室对这些泻肚的人进行了妥善的医疗，整天不学习、不劳动，我什么病没有，也跟着在屋休息。外边的医生也派来了，到监房看了看，听说也到厨房去了。所长和王科长到3所，所长问我跑肚了没有？我说没有，并且说：“泻肚子是吃咸菜吃的，这几天在咸菜里发现有蛆。”

王科长问：“怎么没报告呢？”

我吱唔说：“是的，没有报告。”接着我又说，“这次泻肚与西红柿、甜瓜没有关系。”所长同意我的意见。

后来经过所方与外来医务人员调查，确认是咸菜有问题。一所在大厨房做饭的战犯，没有把咸菜洗干净，以致使病菌传染，发生了普遍性的泻肚。较重的患者由医务室集中到3所53室。金班长把铁丝绑在窗子上，然后挂上一些大玻璃瓶，瓶子装有药水，给这些人点滴。事情本来不大却惊动了抚顺市。第三天中午吃海带炖猪肉、大米饭。我想，大家正泻肚，怎么能吃猪肉呢？有人说：“这是政府的照顾，大家拉稀，把肚子拉空了，该增加营养了。”我们休息了三天才算恢复正常。

邬国贤说：“我一个大甜瓜没舍得吃，给没收了，真可惜。”

我开玩笑道：“就数你那个甜瓜好，真可惜。你可以给一所赵炜提意见，因为他们不注意卫生，影响你的甜瓜没吃到嘴。”

10月份，苏共召开22次代表大会。周总理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在苏共22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严重事件，开创了在一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攻击另一个兄弟党的恶劣先例。周总理表示不同意这种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作法。周总理在莫斯科没有呆几天就回来了，回到北京，毛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总理率领的中共代表团。这件事发生之后，我们战犯感觉到中苏两党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有了不同的意见，最终闹得不欢而散。蔡省三说：“毛主席到机场迎接周总理有很大的意义，说明周总理在苏共22大上的发言是正确的，看来中苏两党关系复杂化了。”

谭冀平对我说：“苏共22大结果不圆满，周总理没有在莫斯科多呆几天就回来了，中苏两党前途不乐观哪。”

一些战犯特别不同意把斯大林的灵柩迁出红场，认为赫鲁晓夫做得过分，我说：“人已经死了，这样对待是不对的，赫鲁晓夫这个人肚量太小，怎么那样仇恨斯大林呢？”

“可能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对赫鲁晓夫不客气，压制了他。所

以，这回进行报复。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挖坟盗墓是最不道德的事情。”这是周上凡与我小声说的。

《人民日报》把霍查及赫鲁晓夫的两篇文章刊登出来了。战犯们都感到霍查批评赫鲁晓夫是一针见血，觉得赫鲁晓夫的文章没有说服力。我认为大国不应该欺负小国，尤其是不应该断绝国交。苏联把海军撤出发罗拉，将阿尔巴尼亚送给帝国主义，这种作法是赶尽杀绝，想把阿尔巴尼亚一手掐死。

战犯谈论这个问题是偷偷摸摸的，认为赫鲁晓夫有问题，霍查也不对，中国共产党是支持阿尔巴尼亚的。战犯的理解都有片面性，究竟何为对错，谁也不敢公开说。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一知半解，不敢妄自发言，说对了算是碰上的，说不对说我“造谣”“污蔑”，麻烦就多了。虽然我嘴里不说，心里也有一个想法：我认为赫鲁晓夫欺负霍查，中国共产党要打抱不平。至于“理由”谁都可以说上一大堆，谁都可以当原告。没有正式学习，没有叫我们暴露思想，过去就算了。

一天下午，姚步烈回来了。姚步烈是春天从这里解走的。解走的时候，我想，可能把他解到北院监狱，或枪毙了。可是走了半年，现在又回来了！我纳闷怎么没有枪毙？这是宽大无边哪！有人说，这回可能转变。但愿如此。

12月18日，我因为写材料没有出工。下午4点钟，电灯亮了，我从50室到51室一看，谭冀平与黄玉元两个人注视报纸上的文章，他们看完了，各自走开，谁也不说话。我走到桌子前，把报纸拿到手，里一翻，外一翻也放下了，什么也没看见。黄玉元过来把这张《辽宁日报》的正版往我跟前一推，我再一看：啊，特赦！我赶紧抓起来，看看是什么日子的报，是1961年12月18日的《辽宁日报》！我看报有过经验教训，无论什么报到我手，一向是先看日期，因为过去看报出过笑话。1947年春，在北京，我桌子上有一张《华北日报》，刊登着京戏广告，我发现有程砚秋的《荒山泪》，于是我就到处打电话，请朋友听戏；又派人到开明戏院买票。晚上，我同朋友都到

了开明戏院,一看不是程砚秋的《荒山泪》,是别人的戏,我问戏院子,人家也不知怎么回事。我责备他们说:“不是程砚秋的戏,为什么在《华北日报》上登海报?岂有此理!”

经理出来一再对我婉说:“我们没往《华北日报》刊登《荒山泪》的海报,最近程老板也没上台呀!”吵了一顿回来了,到家把报纸找出来一看,原来是1946年春天的旧报,是预备包东西的旧报纸。从那之后,每拿报纸必先看日期,今天,一看有特赦消息,便仔细看了日期,这才相信,这是最近的事情。

黄玉元、谭冀平都不说话,这俩人从不乱说乱动。他们不说话,我说什么呢?我也不说了。我与黄玉元走出51室,我对他说:“你很有希望,乐在心里吧。”

收工回来,各屋吵吵嚷嚷,大家还没看到特赦的消息,尚传道问我:“有什么事没有?来报没有?”这是他的习惯。

我装着十分平静,说:“我没出屋只写材料了,我看对门来了一份报。”

饭后,消息传过来了,“特赦令下来了!”“主席颁布了特赦令!”“这是第三批了!”“我算计该有了!”“每年一次,一进12月就有门。”“这回人数少不了。”“关梦龄你在家不知道这个消息?”“我没看报嘛。”我这样说,减少一些麻烦,我不爱看报,他们知道。

特赦令下来之后,战犯们仨一群,俩一伙,交谈起来。艾毓英、许权、刘非、邬国贤这一小伙汉口同乡;胡汉文、贾斗奎、黄家驹一个生活小组的;我、谭冀平说得来的;黄炳寰、陈旭东、张国泰性情相投的……这些小圈子平素虽然不怎么显露,但是人人知道,他们常常谈一些私房话,谁也不反映。特赦令公布之后,这些小圈子活跃起来,估计谁有希望?政府最近找谁谈了话?谁写了“和平起义经过”的材料?谁的表现不错?谁的罪恶少,历史简单?用这些蛛丝马迹,来衡量特赦的可能。

我想别人,也想自己。半年前我曾对索取材料的政府人员说过:“我想争取第三次特赦。”这次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的

第三个特赦令呀！

.....

关梦龄 1963 年于抚顺释放前后亲笔

李占恒 1988 年于沈阳整理一稿

1998 年于沈阳整理二稿

①蔡省三：原国民党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蔡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一直是战犯学委会的成员。1975 年特赦后欲去台湾，未准，滞留香港发表了许多回忆文章，较客观地介绍了自己的战犯生活。

②刘所长：即代所长刘凤奎同志。

③（姚步烈）一定要结婚：姚步烈原国民党少将政工处长。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期间，自以为所方护士×××爱上了他。姚向所方提出与×××结婚，达到纠缠的地步。据所方医生介绍，姚此举属精神病症状并予以积极治疗。后来姚病逝于战犯管理所。